

资源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之否定

——论自然科学、唯物辩证法与价值理论的协同发展

陶 江

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要从基本方法和“基因”层面的变革开始。19 世纪的自然科学限制了辩证法的水平和马克思的视野；《资本论》存在“基因”缺陷。马克思不了解商品的“原子核”；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没有建立起劳动与需求、效用与价值对称的微观结构；没有发现“需求二重性”。但是，《资本论》的内在逻辑通过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可以将劳动价值论升格为“资源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需要反思。唯物辩证法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将转化为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与价值理论中的“基因”缺陷有必然的联系。《资本论》的“基因”修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将对 21 世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资本论》 唯物辩证法 劳动价值论 资源价值论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根基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进步，必然推动前两者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必然制约前两者的水平。在这种深层基础演进的历史背景中，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问题，可获得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启迪。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尝试通过这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探讨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方向和方法问题，提出资源价值论的观点。期望得到学术界的指教。

一、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中外历史上自古以来就存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到了 17 世纪至 19 世纪，当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成果，才使它获得空前飞跃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水平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是平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又增加了许多伟大而辉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导致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重大进步，也导致了人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如果用人类在微观领域的认识水平来比较这种时代的差距，那么在 19 世纪，人类的认识还局限在原子和细胞层次，而现代人类的认识水平已经深入到粒子和基因层次。当自然科学取得全面的重大发展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它在各个学科中的

表现形式也应该随之变化。

就唯物论来说，在宇观层面，我们已经观察到遥远的星系和复杂的天体物理现象。在微观层面，我们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夸克（组成粒子的物质）的层次；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已经深入到 DNA 的层次。就辩证法来说，在各个层面的物质结构及运动变化，都表现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我们知道，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然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深刻的启迪。诚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被看作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适用的。”根据笔者的粗浅认识，自然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有可供社会科学借鉴的一般意义：

(1) 科学认识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认识需要不断深化，不存在绝对真理。

(2) 继承与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前人的矛盾和不足，往往是后人发展科学的起点。

(3) 个别—特殊—一般，否定之否定，是科学认识 and 发展的普遍的规律。

(4) 科学发展需要多种方法的互补。如，技术实

验、归纳演绎、数理逻辑、抽象思维在确定方向、证实假说、发现规律、思想实验和科学预见方面各有所长。

(5) 科学的发展需要广度和深度、宏观和微观的协调发展。譬如,达尔文进化论是建立在对广泛的群体样本的研究之上的,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是建立在对单一品种群体的深入研究之上的,都不可能解决遗传变异的本质问题。而现代分子遗传学,从分子层面解决了遗传变异的本质、机制和生物本质的同一问题。

(6) 科学发展总是从易于把握的现象出发,逐步延伸到难于把握的层面。每一个新的研究层面的打开,都带来新的挑战 and 科学认识的重大变化。譬如现代宇航技术改变了天体物理学,我们可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去研究生命起源、宇宙演化、物质运动规律和未知领域。再譬如,类星体的辐射强度相当于太阳的 10^{13} 倍,这样强的能量无法用人类现有知识来解释。

(7) 科学发展是互动的,不同学科之间可以互相启发、借鉴、利用、协同和交叉。这是辩证法规律普遍性的表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早已存在,物理学概念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大量运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影响,都是明显的例证。

(8) 20 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发现普遍的对称性;是科学研究深入到物质的微观领域;是微观领域的创新推动宏观领域的创新。例如,分子生物学与现代生物工程,原子核物理与能源开发,基因技术与疾病预防、治疗等。在经济学发展的问题上,是不是存在同样的规律?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经济学中的“原子核”结构或者“DNA”结构?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创新会不会导致经济学结构的重大创新?

二、《资本论》的方法与出发点

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采用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起点是极其重要的。起点的选择会不会受到历史限制?我们知道,以原子作为出发点的物理学和化学、以细胞作为出发点的生物学,都存在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原子内部和细胞内部精细结构的发现,都导致了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的革命。然而直到 19 世

纪末叶,物理学还停留在原子层次,刚刚发现电子的存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时,生物学刚刚弄清细胞是由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到马克思逝世时,生物学仅仅知道细胞核决定生物的遗传,还不清楚它内部精细的对称结构。自然科学的水平限制了唯物辩证法的水平,《资本论》的起点很难超越时代的限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概念来形容研究的起点。他把商品比作财富的“元素形式”(原子),把商品的价值形式比作经济的“细胞形式”,于是商品成为分析的起点。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核外电子的俘获与释放取决于原子核的结构,原子核的性质决定了原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细胞是由细胞核与细胞质组成的,细胞核包含了生命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原子核与细胞核内部,都有精细的、对称的结构,这些结构,决定了这些物质的性质。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这是一种辩证的、类似于电子与原子核、细胞质与细胞核的对立统一的结构。这相当于当时生物学对细胞结构的认识,超越了当时的物理学水平(原子不可分)。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视野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可能猜想商品的“原子核”结构或者“细胞核”结构。当时的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和物质运动规律(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重要定律),剩下的任务是精确化与应用问题。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也表达得很清楚:“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对社会科学有强烈的制约作用。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内部矛盾时,不可能自觉地向更深的层次进展,仅仅停留在商品二因素的层次上。从科学发展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来看,需要突破这个时代的限制。而突破的动力来源于《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并不需要强加外部的力量!

三、《资本论》逻辑的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

《资本论》的方法是科学的,它的逻辑是有生命力的。它具有自我复制、自我修复、新陈代谢的能力。马克思不仅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起点。

(一)《资本论》商品元素矛盾的“显形结构”与“隐形结构”

《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概念,然后指出,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按照这些概念之间的关

系,我们可以组成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显形逻辑结构”(图1左侧)。由于还没有涉及到市场、供求、价格和转形等问题,这里分析的商品,显然是均衡条件下的抽象样本。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价值等于效用。所以,马克思实际上舍象掉了一个与劳动对应的、以需求为基础的“隐形逻辑结构”(图1右侧)。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宇宙存在普遍的对称性,对称美是科学美,对称性是科学预见和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譬如,粒子物理学家证明,所有的粒子都有与之对称的反粒子;分子生物学家发现,DNA是旋转对称的双螺旋结构,很像旋转楼梯,连接双螺旋的“楼梯板”(承载遗传信息的基元),是由A-T、G-C四种碱基组成的两两对应的碱基对。细胞分裂时,连接DNA双链的碱基对首先解开,形成单链结构。每个单链结构各自寻找互补的化学物质,完成自我复制。在复制过程中,DNA具有自我修复缺陷的能力。图1左侧很像DNA单链结构中的一个横截片段,但它是自我复制的基础。根据对称性原则,图1右侧的隐形结构应该与图1左侧的显形结构对称。而图1的内在逻辑通过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转化为图2的对称的逻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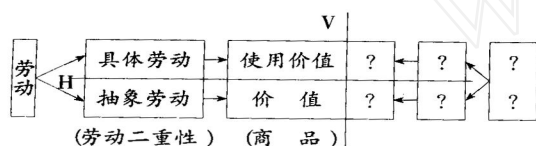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论》商品元素的显形逻辑结构和隐形逻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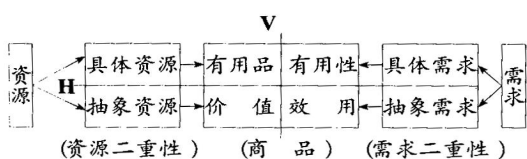


图2 《资本论》商品元素逻辑结构的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

(二)从图1到图2的复制和修复过程

1. 分解商品元素的“原子核”——使用价值

修复过程是从使用价值概念的分解开始的。在商品的两个因素之中,使用价值是人与物(客体)的交换关系,是第一性的;价值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是第二性的。使用价值在商品矛盾中的作用相当于原子中的原子核。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意识到商品的“原子核”。但他毕竟是千年的思想伟人,他对使用价值概念内涵的充分把握,实际上分解了商品元素的“原子核”。

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他又说: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以实现。显然,前后两种规定都符合常识,却存在矛盾!如果使用价值等同于商品体,它在使用或消费之前已经是现实的、在使用或消费之中恰恰被消耗掉。前后两种规定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

产生释义矛盾的原因是:使用价值概念是一个矛盾体,它包含两种内涵。一种是有用性,一种是效用。有用性依赖有用品;具体劳动生产有用品;因而有用性以供给为必要条件。有用性又不等同于有用品;它是需求主体对有用品特殊功用的具体评估,与供给方对有用性的预期无关;因而又以需求为必要条件。效用则是需求主体对有用性的抽象评估和感受。释义矛盾所表现的恰恰是使用价值概念的辩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可能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相互对立与转化的关系。马克思在无意中分裂了商品的“原子核”,^①释义矛盾成为《资本论》逻辑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起点。

2. 引入“需求”和“需求二重性”的概念

使用价值概念被分解后,由于有用性和效用都依赖需求主体的评估,我们必须在图1中引进“需求”的概念,它应该与“劳动”相对应。另外,图1左侧有“劳动二重性”,按照对称性原则,可以假设在其右方存在对称的“需求二重性”。这些新引进概念的逻辑关系是:具体劳动决定有用品,具体需求决定有用性,有用品与有用性对立统一;抽象劳动形成价值,抽象需求形成效用,效用与价值对立统一。

3.“劳动”概念修改为“资源”概念

需求概念引入图1之后,劳动概念显得相对狭窄,与需求并不完全对称,有必要进一步扩展。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是全部资源。于是,图1左侧的劳动概念应该修改为资源概念。相应地,劳动二重性转变为资源二重性,劳动价值论转化为资源价值论。

4. 组成双向对称的逻辑结构

经过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我们填补了图1右侧的空白,修复了图1左侧相对狭窄的概念,组成了图2的逻辑结构。比较图1与图2的结构,读者可以看到:

(1)“使用价值”的分解,触发了复制和修复过程,导致了新的商品矛盾结构。^②整个过程取决于图1原有概念和结构的内在动力,不需要强加外力!

(2)在方法运用和概念组合上,图1是图2的基

础。图2不过是对图1的复制和延伸。

(3)图2是沿H轴和V轴双向对称的结构,这类DNA双螺旋结构中的一个横截的基本片段。H轴以上都是特殊的概念(各种具体、特殊、不同质、不可比的资源和需求),H轴以下都是一般的概念(抽象、一般、同质、可比的价值和效用)。

(4)“效用”与“需求”概念终于在《资本论》的基础结构中取得显要的稳固的位置,它们在《资本论》基础结构中的隐形状宣告结束。

(5)图2既建立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沟通的桥梁,又有重要区别。它的多维辩证结构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明确区分了价值与效用,表明了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它解释了使用价值概念的现代存在方式,在更深刻的层面重新恢复了古典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析结构。

四、劳动价值论与资源价值论

从图1到图2,劳动二重性转化为资源二重性,劳动价值论被资源价值论所取代。然而,劳动二重性仍旧存在,它是资源二重性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而且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特殊的作用。所以,资源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肯定之否定。这是图2逻辑结构的结论。还可以结合资源与需求的现象结构来解释这个问题(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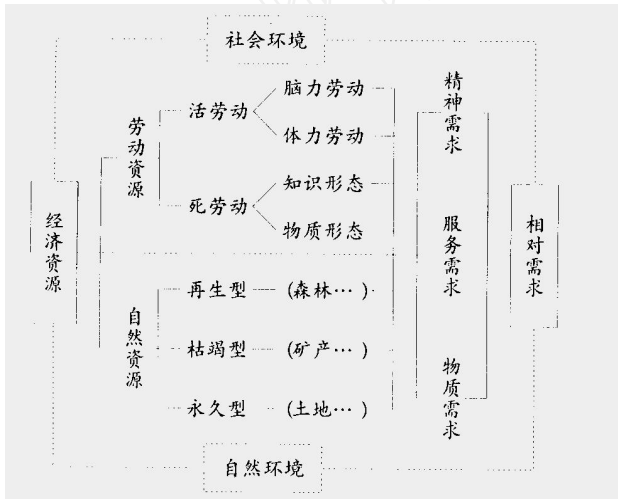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资源与相对需求的简化结构示意图

图3中间虚线为两大类资源、需求、环境的划分线。虚框结构是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本文假设这两个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并忽略对它们的分析。图3对“经济资源”和“相对需求”按照单纯因素组成了简化结构(实践中各种因素往往处于混合形态)。此外,有几个问题要特别说明。图3是实际系统,没有单独的资本形态。“劳

动”是广义概念。在“知识形态”的“死劳动”中,仅含保护期内的专利、技术、商誉等有偿资源,而人类社会积累的庞大的科学技术和文明资源,已成为免费的公共资源。人类仅仅对保存、传授这些资源的劳动进行偿付。在“自然环境”中,也有许多资源是无偿的,如气候、水源、空气等。但如果遭到破坏,社会要以一定方式偿付(如厄尔尼诺现象、温室效应)。“永久型”资源中,土地仅仅指非农牧用地;“地力”则属“再生型”资源。

图2是从《资本论》延伸出来的逻辑结构,图3是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结构。这两个结构是相吻合的。它们都表明,劳动价值论应该被资源价值论所替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一)资源价值论符合哲学价值、自然科学规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 我们姑且把哲学价值定义为客体对主体产生的积极效应。经济学的价值虽有特殊性,也应该符合这个一般定义。经济价值来源于资源耗用产生的净正效用(需扣除外外部性造成的负效用)。它的来源不仅包括广义劳动资源,而且包括其他形式的资源。当然,经济学的价值限定在生产、占有、交换、分配和补偿的范围之内。不破坏环境平衡的无偿获取,不计入经济学的价值范畴。

2. 从生命运动的本质来看,劳动在本质上是能量支出,也遵守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如果考虑生物界较低的能量转换效率,劳动消耗的自身能量只能有少部分再转换为自身能量。然而,人类获得的能量却远远大于劳动消耗的自身能量。答案很简单,人类劳动获取了大量的外部能量来维持或扩大自身能量。人类获取物质、服务和精神产品的终极目的是维持生存发展。根据唯物论的本质观和质能互换的原理,可以抽象地用能量作为客体对主体产生效用的标准。那么,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为人类开发、提供、节约和保持能量的一切手段,都是价值的可能来源。如上所述,经济学的价值限定在特定的范围。

3. 资源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需求推动资源的开发、配置和优化;资源限制需求的总量、结构和层次。价值代表资源的有效耗费,效用代表需求的有效满足。一个是支出,一个是获得。两个矢量的方向不同、发生主体和时间往往不同。所以效用不是价值。效用价值论混淆了不同方向的矢量。单纯的资源耗费也未必成为价值。两者相互制约、共同决定、数量可比。在可支配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下,

价值总量及其分配结构与效用总量及其分配结构是同时决定的、是对等的。偏重于任何一个侧面都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价值理论。

4. 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资源价值论。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环境平衡和自然环境平衡,社会环境的平衡涉及对人类资源补偿的动态平衡,自然环境的平衡涉及对自然资源补偿的动态平衡。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关注前一个平衡,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要求。忽略了任何一个平衡,都会遭致特定形式的惩罚和强制补偿。其代价往往都是极其惨重的!

5. 资源价值论强调所有资源的有效耗用是价值的来源。它也承认分配制度、市场规律、外部性可能造成的剥削、扭曲和失衡。但剥削是广义的,包括对人类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剥削。狭义的剥削概念不符合时代要求。任何剥削都会遭致反抗和报复,但形式截然不同。这里强调的自然平衡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凸现。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时代局限性。

(二) 资源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之否定

劳动价值论虽然被资源价值论取代,但劳动资源是极为特殊的。它在全部可支配资源中是本位的、能动的、核心的和主导的。资源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之否定。可以从如下角度来理解:

(1) 劳动奠定了价值的标准。劳动是体力、智力、精神和生命时间的消耗和付出,是负效用;效用是体力、智力、精神和生命时间的补充和延续,是正价值。两个流量的方向不同,数量可比。一切形式的劳动付出都必须得以再生和延续。这是生存的底线和基本规则,也是价值的标准。市场选择可以引导劳动资源的配置,但如果导致劳动资源入不敷出,则危及到经济体系的稳定,需要破坏性调节或非市场行为的调节。价值是有弹性空间的,但它的平均值是刚性的,是具有强制力的。

(2) 活劳动是所有资源中的能动因素,死劳动和其他资源是通过活劳动来开发和利用的。

(3) 生存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广义劳动的活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重要的,但人已经成为地球的主人。对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4) 随着社会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的发展,人均可支配资源与需求层次也同步提高,狭义劳动必然扩展为广义劳动。广义劳动资源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和主要的价值来源。这是历史过程,也是认识过程。

(5) 广义劳动力的内在价值不断增加,提高了人类自身的价值。人均可支配资源的增加导致需求层次提高(如对休闲、知识、时尚和精神需求增加),对广义劳动力的补偿相应提高,广义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断增加。这从整体上提高了人类自身的价值。

(6) 人类积累的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文明都是广义劳动的产物。这些产物基本成为免费的公共资源(人类仅仅对保存、发展和传授这些资源的劳动进行支付)。如果按照实际发生的效用循环系统,来评价广义劳动资源在人类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作用。则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度将大大提高。

统计资料表明,广义劳动资源的增长极为迅速、相对地位不断提高:(1) 劳动力资源占社会资源的主要部分。联合国对 100 多个国家的统计研究发现(1996 年),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资源中,财富资源(资本、有形资产)占 12%,自然资源(土地、矿山、水)占 24%,人力资源占 64%。仅有少数中东产油国家,人力资源低于 50%。(2) 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占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仅以美国的工薪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例,自从 1967 年以来,一直在 70%~75% 之间变动。(3) 人类需求层次的提高主要依赖更多的服务产品和精神产品,相对减少物质产品的需求。例如,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同步。

五、对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方向和方法的反思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比较重视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但是,如果唯物辩证法不能与时俱进,就可能转化为形而上学。笔者以为,如下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1) 忽视真理的相对性,忽视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局限性,不能通过基本方法的变革来发展劳动价值论。

(2) 把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归咎于辩证逻辑的方法,否定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有效性,漠视自波普和库恩以来科学哲学中重视理性思维的发展趋势。

(3) 把简单地放弃劳动价值论,作为提出科学的价值理论的前提。忽视劳动价值论内在的强大的变革动力,忽视历史的方法,忽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4) 对商品矛盾的认识,始终停留在价值和使用权价值矛盾的层次上。辩证逻辑只能向上延伸、不能向下延伸。没有探索经济学“原子核”(或“细胞核”)的意识。从来不了解使用价值在商品元素中的“原子核”(或细胞核)地位和“原子核结构”。对自然科

学在微观领域取得的辉煌成果的哲学和方法论意义漠然处之。

(5) 不明确价值和使用价值谁是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争辩始终围绕着价值问题,使用价值处于陪衬甚至被遗弃的地位。^③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始终置于人与物的交换关系之上。更不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与价值理论中的基因缺陷之间的必然联系。

(6) 强调价值的客观性、实体性,忽视效用的客观性和实体性。效用本来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客观评估,却似乎不是唯物的概念。效用当中的精神满足、不确定性等尤其被视为主观的成分。^④

(7) “劳动”与“需求”的关系不是辩证的。似乎“劳动”是唯物的、第一性的;而“需求”的唯物性质和第一性问题从来是含糊的。只知道“劳动二重性”,不知道“需求二重性”的存在。更不能将劳动二重性转化为“资源二重性”。马克思首创的极富科学价值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始终处于孤立的停滞的状态。

(8) 热衷于纠缠表层的“转形问题”,甚至当作“世界难题”来处理,却不能从“基因”层面发现问题的根源。“转形问题”的提出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有深刻的教训!多数西方学者并不理会辩证法,提出“转形问题”已经达到他们视野的极限;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以为《资本论》的辩证法无懈可击。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学界竟然不能发现形式逻辑上极其简单的“释义矛盾”,不能复活《资本论》的灵魂、不能修复和发展《资本论》的逻辑、不能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推动经济科学的重大进步。这是值得深思的思想史悲剧!

(9) 积重难返,缺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感。依旧偏重人与人的关系,缺乏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谐的宽广视角来确立现代的价值理论。

(10)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完全对立起来。否定经济科学规律的同源性,继续期望在经济学里搞“一学两制”,缺乏历史的辩证的经济学发展的范式观念,缺乏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辩证综合的意识。

六、结束语

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各有优劣,可以取长补短。笔者并不排斥其他方法。但唯物辩证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供选择和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尚待开发。我们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唯物辩证法的水平却依旧停留在马克思

所处的时代。我们提出了许多极有创意的思想,却缺乏主导方法的创新。方法的不足导致了体系结构的缺陷,难以组织和容纳经济学思想的精华,难以对经济学的发展提出有远见的规划。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理论经济学扬长避短、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潜力;也延误了整个经济科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擅长唯象和实证的方法,相对缺乏辩证思维和科学预见的能力,有很多局限性。比如,马斯洛夫的需求层次理论至今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水平。辩证法具有普遍的效力。自然科学处处体现着辩证法的规律。如元素周期表与DNA结构都是辩证法。虽然西方不乏耸人听闻的范式危机论,至今还无人问津经济学的“元素周期表”、经济学的“染色体”和经济学的“基因图谱”。经济学的“基因革命”还遥遥无期。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辩证方法的延伸,可以构成以图2为基础的多维对称的辩证结构。这类似于DNA双螺旋结构的一个横截的基本片段。由此出发可以探索经济学的基因结构,发展从基因的层面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方法。看一看方兴未艾的生物科学的基因革命,笔者冒昧预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对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我国理论经济学界更是重任在肩。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的阶段,需要深层理论的创新和支持。如果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将经历更加漫长曲折的里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将更加复杂和严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之否定,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优化环境、迎接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但从物与人的关系看,自然科学更为基础;从历史发展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成熟;从隶属关系看,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从阶级和政治立场看,对科学科学的干扰和争议相对严重。这些是笔者取舍的缘由。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杨振宁在【世纪大讲堂】的学术报告。尽管他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宙不守恒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8、37~38页,人民出版社,1979。

参考《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3,1885-1886个别补充),中文版,22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这里略去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更全面的分析见拙文《资本论的“基因缺陷”与八个逻辑问题》。

更详细的逻辑推导过程,见笔者在文献中的相关拙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参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

⑪这类物质的原子结构:中子与质子组成物质的原子核,中子是中性的,质子携带的正电荷、与核外电子的负电荷相等。对商品来说,有用性与效用组成商品的“原子核”,有用性是中性的,效用为正(获得),价值为负(支出),两者亦应相等。

⑫其能量类似于原子核的分裂。使用价值就是商品的原子核。

⑬这使人联想起,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界,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形而上学地看待实践的作用,曾经长期关注细胞质的研究,忽视甚至否认细胞核在遗传上的决定作用。

⑭在微观的物理世界中,对运动物质的测量恰恰也是“测不准”,只具有统计的精确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申先甲主编:《潜科学丛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出版社,1998。

6. 申先甲等编著:《物理学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7. 葛能全编著:《科学技术发现发明纵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8. 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中文版,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9. 徐晋麟等编著:《现代遗传学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0. 梁邵荣等主编:《近代物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11. 广重彻:《物理学史》,北京,求实出版社,1977。

12. 陶江:《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4)。

13. 陶江:《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载《北京社会科学》,1996(4)。

14. 陶江:《理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哪里开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3)。

15. 陶江:《资本论的“基因缺陷”与八个逻辑问题》,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

16. Jiang, Tao, 2001. “ ‘ The One Who Tied the Bell On the Tiger Can Take It Off ’ ——The Answer to the ‘ Centenary Puzzle ’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 USA SSRN, Political Economy, January 3.

17. Jiang, Tao, 2001. “ A New View of CAPITAL: Genetic Imperfection and Self-reparation. ” USA SSRN Political Economy, May 1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N)

(上接第15页) (市场)型政策工具转化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未来环境政策的取向必然是激励型的政策工具替代目前正在实行的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本文并未就我国政治系统演化作具体分析,从而不能系统分析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过程,其政治均衡分析也就作了相应的简化处理,未来研究的一个有趣的方向就是,系统分析我国政治系统的演化进程,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公众和企业对环境政策工具选择政治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建立博弈模型,求解政治均衡路径,一个完整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理论还应将环境目标作内生化处理。

注释:

Bergstrom, T. C., 1979. “ When Does Majority Rule Supply Public Goods Efficiently? ”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 pp. 216 - 227.

Sigler, G., 1971.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2, pp. 3 - 21.

Becker, G., 1983. “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pp. 371 - 400.

Oates, W. E. and Portney, P. R., 2001.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Washington D. C., Discussion Paper 01 - 55.

Cropper, M. L.; Evans, W. N.; Berardi, S. J.; Ducla - Soares, M. M. and Portney, P. R., 1992. “ The Determinants of Pesticide Regulati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PA Decision Making.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pp. 175 - 197.

Hird, J., 1990. “ Superfund Expenditures and Cleanup Priorities: Distributive Politics or the Public Interest? ”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9, pp. 455 - 83.

Murdoch, J. and Sandler, T., 1997. “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a Pure Public Good: The Case of Reduced CFC Emissions and the Montreal Protocol.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3, pp. 331 - 350.

Buchanan J. M., Tullock, G., 1975. “ Polluters’ Profits and Political Response: Direct Controls Versus Tax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pp. 130 - 147.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1994. “ Protection for Sal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pp. 833 - 850.

⑪⑫⑬Aidt, T. S. and Dutta J., 2004. “ Transitional Politics: Emerging Incentive - based Instrument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7, pp. 458 - 479.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流动站 武汉 430060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J)